

# 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

黃自進

## 摘要

九一八事變自始就是關東軍自導自演的軍事行動。主政的若槻內閣雖然事前沒有參與，事後也沒有鼓勵，事變的翌日所召開的緊急閣僚會議並曾達成不將衝突層次升級化的共識。但是自始就不從中日關係惡化此一角度去觀察事變，反而把事變視為是日本與列強間的攻防戰。因此，當發現列強無意制衡日本時，對事變的態度遂逐漸改變，從反對轉為默認，進而演變成支持。而犬養對九一八事變的觀察，卻是立足在中國政潮演變的此一角度。由於一開始就不以列強的反應為考慮要點，因此更能深刻認識到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政壇所造成的衝擊。犬養深恐九一八事變會成為日本逼國民政府走向赤化的絕路，而國民政府的赤化會進而破壞東亞權力的均勢，短期而言將引起日本與簽訂九國公約的西方列強衝突，長期發展來看，又勢必會導致日本與蘇俄的爭戰。基於此一認知，他認為早日解救國民政府的困境是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由於犬養急於早日善後九一八事變，因此當他擔任總理後，立即派遣密使試探和平。

交涉的過程雖然稍有曲折，但雙方的代表以及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關係，使雙方的交涉能順利擺脫外來的阻擾。至於交涉的內容，更未曾引起雙方代表之間的爭執。導致此次交涉中止的卻是當時日本的政治環境。九一八事變雖然不是政府既定政策下的產物，但關東軍急進政策所帶來的戰利品卻普遍贏得日本官僚系統及軍部的讚賞。逼使犬養中止和平交涉的關鍵，就是因遭受這股來自行政官僚體系及軍部的反對壓力所致。而犬養最後遭受槍殺的命運，也是起因於他與這股反對將東三省回歸原狀的勢力對抗所致。犬養的驟

逝，斷絕了中日溝通的橋樑，也斷絕了中國方面謀和的希望。自此中國喪失了與日本政界溝通的管道，也喪失了對日本政府仍能抗衡軍部掌握全國大局的信心。

# 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

黃自進\*\*

- 一、前言
- 二、與國民政府的淵源
- 三、對九一八事變的看法與立場
- 四、密謀和平的經過
- 五、謀和失敗始末
- 六、結論

## 一、前言

九一八事變是導致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衝突起點。事變時期，時任日本總理的犬養毅曾密謀與中國進行和平交涉。此一事件未廣為史學界所重視，這也許起因於此一行動並未扭轉中日兩國的交戰事實。然從近代中日關係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此一歷史事件反映了日本當時政局的動盪，也顯示出中日兩國走向戰爭的必然性。對瞭解近代日本政局與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發展有重大意義。

犬養毅是歷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元老政治家，<sup>1</sup>以熱心援助中

\* 本論文之撰寫，承蒙日本女子大學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供萱野長知致犬養毅的電報原始文件，才得以順利完成，特此敬致謝意。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up>1</sup> 犬養毅生於 1855 年，是日本本州岡山縣人，幼年時最大志向是希望能成為一漢學教師，故自幼就熟讀經書，對中國歷史、文物典章均有相當造詣。1876 年，進入慶應義塾就讀，奠定了他往後在日本政界發展的基礎。1881 年因慶應義塾創辦人福澤諭吉的推薦，任統計院總裁大隈重信的幕僚，爾後即以大隈重信的左右手身分，活躍日本政壇。1890

國革命運動而著名於中日政界。在孫中山以日本作為革命活動基地時期，犬養毅除給予經濟援助以外，也組合日本各種民間團體給予有力援助。同時他也擔任了孫中山與日本政界、財界接觸的橋樑。對孫中山推動革命運動而言，他的支援是一不可或缺的助力，因此，犬養一直被中國革命志士視為是日本政壇中最能共鳴中國革命理念的政治家，也是革命黨人與日本政界之間的重要溝通管道。<sup>2</sup>尤其是 1925 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推動國家統一政策積極北伐，卻面臨日本政府百般阻撓之際，犬養一直是國民政府積極爭取作為與日本政府溝通的對象。國民政府對犬養的禮遇，一方面顯示了國民政府對犬養的依賴，另一方面也反映著犬養在日本政界的影響力。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日本的主政當局雖為主張國際協調的若槻內閣，但卻無力控制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擴疆行動，遂使事態愈演愈烈。犬養時任反對黨政友會的總裁，對事變所引起的兩國之間的衝突，並沒有斡旋的空間。三個月後當政的若槻內閣因閣內意見不能統合而宣佈總辭。犬養則以第一反對黨總裁身份接任日本總理。雖然政友會一向主張積極拓展日本在華利益，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更以支援關東軍為號召。但身為總裁的犬養，基於對中國民族性的認識及對國際局勢的判斷，遂於接任總理後的第三天派遣密使著手與中國和平交涉。對於犬養的謀和，國民政府即刻做出善意回應，甚至不惜放棄拒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既定政策。國民政府之所以願意改變政策，一方面是深覺國際正義之難求與國聯之不可恃，另一方面是基於與犬養之間的基本信任關係，深信城下之盟事件不會重演。在此時空背景下，犬養的謀

---

年當選第一屆眾議院議員，並連任十七屆。 1898 年大隈重信第一次組閣時曾出任文部大臣，1910 年首創立憲國民黨，自立門戶，活躍於日本兩大政黨之間，代表第三勢力。由於他與孫中山以及立憲派的康有為、梁啟超都有深厚的友誼，被公認為日本政界的中國通，在日本的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1922 年另創革新俱樂部，仍不改初衷以第三勢力自居，要求憲政革新及提早廢除選舉資格的限制。 1925 年，因準備退休，乃解除自身所領導的政黨，舉黨加入政友會。 1929 年卻因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驟逝，黨內派閥林立，派閥領袖相持不下，而得以政友會元老的身份被推為總裁。九一八事變後復以政友會總裁身分出掌內閣，擔任日本第二十九任總理。翌年 5 月 15 日因反對偽滿洲國的成立並且計劃整頓軍紀，被少壯派軍人槍殺於總理官邸，享年七十八歲。

<sup>2</sup> 參閱黃自進，〈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民國 79 年 6 月），頁 236-250。

和無疑的是兩國陷入全面戰爭之前的一線和平曙光。

犬養主導的此一密謀，進行三週後，即因密使身份曝光，在日本軍部及行政官僚系統的群起反對下被逼中止。四個月後犬養遭公然槍殺。戰後以來，以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為題的研究，十分罕見。<sup>3</sup>有鑑於此，本文遂將研究的焦點置於此一和談交涉。其中包括犬養與國民政府的淵源，犬養出任總理到任期內死於非命這一連串政治事件所表現出日本政局的動盪；並在此一背景下探討犬養派遣密使試探和平的動機，其與國民政府秘密交涉的具體內容以及最後失敗的原因。

## 二、與國民政府的淵源

1925年5月，代表日本政壇第三勢力的犬養毅宣佈解散自身所領導的革新俱樂部，而舉黨加入既有兩大政黨之一的政友會。爾後，他辭去眾議院議員以及遞信大臣的內閣職位，正式宣告退出政壇。<sup>4</sup>但他的請辭並不為他的選民所接受。同年7月因他辭職而重行舉辦的補選中，犬養再度當選。不過，重登議席的犬養，已無意過問政事，他大部份的時間是住在遠離東京的信州，過著退隱的生活。<sup>5</sup>

在犬養正逐步退出政壇的同時期，曾與他長時期併肩奮鬥的中國革命陣營卻不斷的重生及茁壯。1925年7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原有的大元帥府擴充為國民政府。改組後的國民政府矢志以統一中國為目標，積極

<sup>3</sup> 蔣永敬在論及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政策的演變時，曾提及犬養毅遣使謀和之事。時任英人在探討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的關係時，也談到犬養致力交涉的努力。馬場明在分析九一八事變與犬養內閣關係時，也論及犬養與國民政府的交涉情況。但以上論文，都是以自己本國對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反應為探討重心，犬養毅的謀和之事僅止於史實上的介紹，既非針對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中日和平交涉做一全面性探討，更欠缺對犬養推動謀和的動機以及其在當時中日關係中所具關鍵地位的解析。見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上冊，頁369-370；時任英人，〈犬養毅と滿州事變〉，《政治經濟史學》（1983年12月），頁50-54；馬場明，〈滿州事變と犬養内閣〉，《國史學》（1974年1月），頁2-5。

<sup>4</sup> 岩淵辰雄，〈犬養毅〉（東京：時事通信社，1958年），頁189-191。

<sup>5</sup> 驚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年），中卷，頁707。

準備北伐。<sup>6</sup>國民政府的改革事業如日正當中，各方面都有具體成效之時，卻看不到犬養這方面有任何呼應。很明顯的，犬養對廣州的變化並不關心。這位曾以援助中國革命而享譽日本政壇的中國通，之所以對中國事務開始保持距離，原因有二，一是如以上所述，他本人已有意退出政壇，自然，對政治性事務的關心不如以往，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關心程度也就隨著降低；另一方面，自 1923 年孫中山採聯俄容共政策以後，犬養事實上即與中國國民黨開始劃清界線，<sup>7</sup>以反共為第一要務的犬養，對仍秉持容共政策的國民政府不予好評，當然也不願表達任何聲援。

犬養雖然已無意再過問中國革命事務，但他在中國革命陣營的既有身價卻絲毫不受影響，他仍被視為是中日政壇中最重要的溝通管道。他受重視的程度，可從蔣介石對他的禮遇上得到佐證。1927 年 9 月，蔣介石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後不久訪問日本。<sup>8</sup>在他抵達東京的記者會上，明示了此次到東京的目的是拜訪犬養毅、頭山滿，以及任職於外務省、參謀本部的老友。拜訪犬養毅、頭山滿被其口頭列為到東京之首要目的，由此可見犬養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果然，在他到達東京的第二天，就去看犬養，證實犬養的確是他訪日的重要行程之一。<sup>9</sup>蔣介石的此次訪日，本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與时任首相田中義一的會談，無疑的是他到東京的真正目的，<sup>10</sup>但是在她見田中義一之前，卻先去拜訪犬養，以便聽取犬養意見，<sup>11</sup>此等事實，皆足以證明犬養仍被革命黨人視為是中日政壇間的接觸橋樑，對他仍寄以厚望。

<sup>6</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年），頁 558-561。

<sup>7</sup> 黃自進，〈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民國 79 年 6 月），頁 249-250。

<sup>8</sup> 蔣介石先於 9 月 29 日抵達長崎，然後轉往神戶拜見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徵求對他與宋美齡婚事的同意，爾後於 10 月 23 日到達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蔣介石秘錄》（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85 年改訂特裝版），上冊，頁 457-459。

<sup>9</sup> 《東京朝日新聞》，1927 年 10 月 24 日；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傳》（東京：原書房，1966 年），中卷，頁 799；又參閱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關係協會，1980 年），頁 22。

<sup>10</sup> サンケイ新聞社，《蔣介石秘錄》（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85 年改訂特裝版），上冊，頁 459-463；又參閱《民國日報》，民國 16 年 11 月 4 日。

<sup>11</sup> 蔣介石是 10 月 23 日到東京，24 日就去拜訪犬養毅，與田中義一會談則是 11 月 5 日。

從犬養的言談中，可以看出犬養對蔣介石頗具好感，<sup>12</sup>但是蔣介石的來訪，並沒有導致犬養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有任何明顯的改變。他對國民政府的北伐政策仍三緘其口，不願表達聲援。甚至對田中內閣在北伐期間公然以護僑為由，三度出兵山東之事，也是刻意迴避，不願表態。事後，也僅止於淡淡地表示：「如果日本僑民已能安居樂業，基於財政考慮，日本應考慮撤兵。」<sup>13</sup>從這些談話，可以理解他無意反對田中內閣的護僑政策。儘管，日本的輿論已明言出兵山東無非是阻擾北伐，<sup>14</sup>犬養仍然認定出兵只是護僑，這種避重就輕的態度，在在證實他已無意支援中國革命。

1929年6月1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舉行總理奉安大典。將孫中山的靈櫬從北平西山碧雲寺移到南京，安葬於紫金山。安葬南京，是孫中山生前遺志。<sup>15</sup>但國民黨選定在北伐告成，全國統一，定都南京後才以國葬之禮舉行奉安大典，除了完成遺志以慰總理之靈外，也意含著向國內外宣示國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此次大典被視為國民黨執政以來的最重要禮典，友邦國家均派特使參加，<sup>16</sup>其中尤以犬養毅在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具名邀請下，<sup>17</sup>以孫中山舊友身份出席，最引人注目。

同年5月24日，犬養毅、頭山滿的家屬以及故宮崎滔天的遺族一行二十八人抵達上海。犬養隨即發表了以「緬懷孫總理遺志，期望兩國有志之士，共謀中日親善」為主旨的公開信。<sup>18</sup>這封信，在當天就被中日兩國媒體廣泛報

<sup>12</sup> 犬養毅接受《政友》會記者訪問時，公開推崇蔣介石是一個正直的人。〈犬養木堂翁漫談〉，《政友》（1928年10月），頁38。

<sup>13</sup> 《東京朝日新聞》，1928年7月20日。

<sup>14</sup> 例如，《大阪朝日新聞》就以社論方式公開反對出兵山東。認為田中內閣如果只是顧慮山東省僑民的安全，只需將僑民集中到青島施與保護即可。東京朝日新聞則以社論方式指責出兵山東無非是左右北伐軍與軍閥之間的戰局，是種干涉中國內政的軍事行動。後藤孝夫，《辛亥革命から滿州事變へ：大阪朝日新聞と近代中國》（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年），頁256-266；《東京朝日新聞》，1928年4月19日。

<sup>15</sup>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3年版），下冊，頁1617。

<sup>16</sup> 同上，頁1619；又參閱《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8日。

<sup>17</sup> 《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2日。

<sup>18</sup> 犬養毅發表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余為日本國民之一份子，數十年來，對於中國國民黨之主義黨綱，皆有深切之認識與同情之表示，昔孫總理曾幾度在日，故余之對於孫總理更有特殊之關係與尊敬。余此

導。<sup>19</sup>由此，也可看出兩國傳播媒介對犬養訪華的重視。此外，犬養訪華期間，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sup>20</sup>立法院長胡漢民、<sup>21</sup>上海市長張群<sup>22</sup>皆分別予以接待，並推崇其為政界前輩，對其長年支持中國革命均表謝意。6月1日舉行奉安大典時，犬養毅更以國賓代表身份參與蓋棺儀式。<sup>23</sup>奉安大典完畢後，犬養再以國賓身份被招待遊覽青島、濟南、北平等地，一個多月後才啓程返國。<sup>24</sup>

從以上所述，可知國民政府對犬養毅訪華的重視。而犬養也在與眾多國民政府要員會談以及從南到北親身考察國民政府在各地的政績後，終於在離華前夕打破多年避談中國政局的緘默，發表了四點談話：

第一、國民政府會永遠存在，定都南京之事實也不會再改變。

第二、蔣介石為現代中國第一實力者，維持蔣介石政權，符合日中兩國利益。

第三、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以關稅為主，關稅的能否增收關係國民政府的生存，日本政府應對國民政府的關稅主張予以特別考慮。

第四、應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在配合時勢的潮流下，改訂中日通商條約。<sup>25</sup>

---

次與頭山滿翁二人承國府之招待，列席南京故先總理之奉安大典，誠生平引為最光榮之事。中國國民黨在故孫總理時，已創立了確定之基礎，而今國民黨諸同志，更秉承總理之遺教，而努力發展完成其偉大之事業，余等不禁尊敬之。孫總理與日本關係之密切，可毋庸贅述，日本國民對於孫總理及中國國民黨，誠有萬分之同情，與可能之援助，故孫總理在卸任中華民國第一次臨時大總統渡日時，日本朝野舉國歡迎，此足表示孫總理與日本友善之密切。今又際茲大典舉行之期，中日間之各懸案，亦適於此時圓滿解決，此次二國誠意披瀝，一致協力於友善之增進，與保持東亞永久之和平，再進一步，而努力於世界文化之貢獻，以副先總理之意志。

<sup>19</sup> 《東京日日新聞》，1929年5月24日；又參閱《申報》，民國18年5月24日；《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4日。

<sup>20</sup> 《申報》，民國18年5月30日。

<sup>21</sup> 《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8日。

<sup>22</sup> 《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4日。

<sup>23</sup> 近藤達兒，《孫文移靈祭之記·附新支那旅行記》（東京：自費出版，1929年），頁39。

<sup>24</sup> 同上，頁61-155；又參閱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年），中卷，頁742-767。

<sup>25</sup> 《東京日日新聞》，1929年6月23日。

從以上四點談話，犬養對北伐後的中國局勢的見解可整理出以下含意。第一點，明確表態支持蔣介石。眾所周知，在犬養此次訪華的前一年（1928）10月，蔣介石已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被犬養稱譽為「中國第一實力者」也是實至名歸；但持平而論，第一實力者只是比較上的稱譽，事實上，蔣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基礎並不穩固，在犬養訪華的兩個月前，首先就有桂系的發難，而討伐桂系之戰剛剛閉幕，接著而來的就是以馮玉祥為首的護黨救國軍的軍興，<sup>26</sup>在這一連串的倒蔣內戰中，犬養此刻的發言，當然代表其個人對蔣的聲援。第二點，支持國民政府的關稅自主權要求。1928年7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7月19日並依照此一宣言，照會日本，聲明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作廢。<sup>27</sup>國民政府之所以強力推展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權無疑的是其主要訴求之一。犬養以關稅權的自主，關乎國民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為由，主張日本政府應特別體諒國民政府的關稅政策。犬養的此一主張，直接地表達了其個人對國民政府關稅自主權的支持，間接地也表達了聲援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立場。第三點，期許田中內閣能全面檢討對華政策。田中內閣成立於1927年4月，成立後的第二個月起就出兵山東，阻礙北伐，其中並爆發了日軍屠城的濟南慘案。此外，在國民政府於1928年開始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時，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強皆能以理性的觀點接受中國關稅自主權的要求，紛紛與中國另訂新約，日本則仍是冥頑不化，堅拒與中國改訂新約。<sup>28</sup>此時此刻犬養主張日本應體察時勢，以平等互惠的精神與中國重訂條約，無疑地反映出他個人也不贊同日本現行的對華政策，間接地也表達了他個人對新政策的期許。

1929年7月，犬養返國。在政友會所召開的歡迎會上，他談到了他的中國之旅。他認為在歷經多年外患內亂的衝擊，再加以地方官吏的苛斂誅求，中國可說是處於有史以來經濟上最困疲的時期。不過，國民政府要員們的勵精圖治，也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中國的有志之士皆能有感於中國之困境而

<sup>26</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頁592-597。

<sup>27</sup>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第2冊，頁367、371。

<sup>28</sup> 白井勝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時代》（東京：培文書房，1971年），頁168-179。

能有捨異求同的覺悟，皆是可喜現象。基於以上觀察，他認為基本上中國是向統一邁進的。

雖然犬養對國民政府的執政能力頗有好評，但是對於國民政府的執政方式卻有所質疑，他認為國民政府面臨三個結構性的難題。第一，國民政府是「以黨治國」，此一體制究竟能實施多久？第二，國民政府採中央集權制。對一個急於恢復國家主權的政府而言，唯有集事權於專一，才可救亡圖存。國民政府採行中央集權制的原委，無非是來自這方面的考量。不過，以中國的歷史演變以及從面積的地緣政治來衡量，聯邦制度才是最符合中國的政治體制。因此，國民政府能否輕易超越歷史上的慣性以及因地廣而造成的統治困難，而繼續推展中央集權制呢？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尊重人權的一面。但今日的中國，卻只有國民黨員被賦與民權，一般的民眾卻無緣享受。今後隨著教育的普及，一般的民眾也必然有一日會群起要求民權，屆時，國民政府究竟能用何種形式使民權普及化呢？<sup>29</sup>

犬養對國民政府統治方式的質疑，無疑地也反映出他對國民政府的關心，他的直言，無非也是基於他對國民政府的期許。孫中山的奉安大典，使犬養從一位已退隱政壇的過時政治人物，又一躍成為日本朝野注目的中國通，他也因此再度成為中日政壇間的接觸橋樑。1929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監察委員張繼專程到日本拜訪犬養毅。張繼之訪日，一方面是為了答謝犬養日前到中國參加奉安大典，另一方面也正式轉達國民政府有意邀請犬養於明年春天再度訪問中國的誠意。<sup>30</sup>對再度訪華，犬養也頗有意願；<sup>31</sup>但是日本政壇的急劇變化，使犬養再度訪華的心願無法達成。原因是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突因狹心症驟逝，黨內因派閥林立，各派領袖相持不下，犬養遂以元老身份被推為政友會總裁。時為1929年10月9日，距張繼的來訪不過一個月。<sup>32</sup>

<sup>29</sup> 犬養木堂，《支那を観て来て》，《政友》（1929年8月），頁5-7。又參閱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年），中卷，頁812-814。

<sup>30</sup> 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年），中卷，頁815-816。

<sup>31</sup> 同上，頁815。

<sup>32</sup> 同上，頁833-834。又參閱岩淵辰雄，《犬養毅》（東京：時事通信社，1958年），頁196-198。

### 三、對九一八事變的看法與立場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犬養毅時任反對黨政友會的總裁。事變後的一個月，政友會所召集的該黨駐東京國會議員緊急大會上，犬養才第一次公開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首先他將九一八事變定位為日本的「國難」。強調九一八事變關乎日本國運的發展，是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是否仍能維繫的一大關鍵。而此等權益是日本歷經兩次對外戰爭所換取的成果，關係到日本既定國策外，也涉及到東北地區一百二十萬日本移民是否能安居的現實生存課題。對於執政的民政黨不能掌握要領立即解決爭端，犬養表達了極度的不滿。認為事變的是非曲直一目瞭然，日本政府應採斷然措施。犬養並強調，事變發生以來三十日，政友會之所以保持緘默，無非是相讓為國，不願因內爭而影響到政府之應變能力，犬養號召全國國民蹶然奮起。<sup>33</sup>

犬養的這篇演講慷慨激昂，不過語意卻異常曖昧，尤其是他強調日本應對九一八事變採「斷然措施」時，卻沒有說明何謂「斷然措施」，更沒有提出具體方案。不過從此次犬養的表態，也可瞭解到他並不反對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用兵的基本態度。這一點和當時主政的若槻內閣的對策是有所不同的。眾所周知，九一八事變是由關東軍一手所策動的，原計劃是將東北直接併入日本領域，爾後則因無法獲得參謀本部的贊同，而改為樹立傀儡政權。<sup>34</sup>對關東軍的計劃，日本政府當局事先並未參與，事後也不鼓勵。甚至在事件爆發後的翌日，所召開的緊急內閣會議中，達成不將衝突層次升級化的共識，<sup>35</sup>並決議壓抑關東軍的軍事活動，以及嚴禁日本駐朝鮮軍團越境支援關東軍等措施，<sup>36</sup>可見事變的初期日本政府的確無意擴大爭端，更無意支援關東軍。犬養公然對關東軍的肯定，當然不只是為了凸顯立場，最主要還是執行政友會既定的傳統對華政策。政友會的傳統政策就是主張東北獨立，犬養的前任總

<sup>33</sup> 犬養毅，〈一致結束して、蹶然國難を救へ〉，《政友》（1931年11月），頁1-2。

<sup>34</sup> 白井勝美，《滿州事變—戰爭と外交と—》（東京：中公新書，1988年），頁76。

<sup>35</sup> 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別巻資料篇》（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114-115。

<sup>36</sup> 爾後，朝鮮軍團終於9月21日入東三省，但此一越境的軍事行動，是朝鮮軍團司令官擅自所為，並非來自天皇的命令。同上，頁114-119。

裁田中義一在執政時，並曾一度將此等主張列為正式對華政策，試圖付諸實施。<sup>37</sup>政友會既然主張東北獨立，對關東軍的軍事企圖，自然沒有反對之理。

犬養對關東軍的支持，隨著關東軍的軍事順利進展，而愈趨積極。同年的 11 月 10 日，犬養在政友會的議員大會上，公開宣稱「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突發性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訂的條約，對日本應享有的權利經年累月的故意漠視，醞釀而成的事變。」<sup>38</sup>從這發言中，可以理解犬養完全接納關東軍的解釋，將九一八事變視為維護既有的權益而不得不採取的非常手段。在全面肯定關東軍行為合理性的前提下，犬養對國聯的干預也做了全面性的批判。當時的國聯在接受國民政府對「日軍的侵略行爲」所提出的控訴後，準備進行國際仲裁。10 月 24 日所召集的理事會中，做出了日軍必須在 11 月 16 日以前撤回到原駐防區的決議。<sup>39</sup>針對此一決議，犬養全面否定。認為理事會以撤兵為第一要義，對中國漠視條約義務之事實反而置於次要考慮的做法，是一種規避現實的錯誤決策。強調日本的主張只是要求中國尊重條約，尊重歷史，這等主張已是「日本民族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對不尊重日本主張的國聯理事會決議，犬養斥為是不理解事變本質的空言，並強調此等事宜本不應任由國聯有干預的空間。<sup>40</sup>言下之意，就是日本無需在意國聯理事會的仲裁。犬養對國聯仲裁案的明示拒絕，無疑地表露他干冒與國聯抗衡之大不韙，也要支援關東軍囊括中國東北的計劃。

以上是犬養毅以政友會總裁的身份，具銜公佈的政見。但是，如細察犬養個人的言行時，卻可發現，他本人對九一八事變的看法與他以公職身份所表達的意見有相當大的差異。10 月 2 日，他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內心的真正想法。在信中，他談到他的不安：

南京當局利用九一八事變而有寧粵之議，此為無可厚非之事，也是事前可預料之舉。但是，南京當局竟而興起與中共謀和，與蘇聯企圖聯

<sup>37</sup> 吉野作造，〈對支政策批判〉，《中央公論》（1928 年 9 月），頁 79-80。

<sup>38</sup> 犬養毅，〈この國難を救ふは我黨の責任〉，《政友》（1931 年 12 月），頁 2。

<sup>39</sup> 白井勝美，〈滿州事變—戰爭と外交と—〉（東京：中公新書，1988 年），頁 97。

<sup>40</sup> 犬養毅，〈この國難を救ふは我黨の責任〉，《政友》（1931 年 12 月），頁 2。

合等等舉動，卻令人擔憂。南京當局此舉不僅將使中國陷入被赤化之危機，也將導致整個東亞震盪不安。南京當局的對策令人震驚。蔣當年在黃埔軍校時期就曾赤化，汪兆銘、胡漢民也都有赤化經歷，馮玉祥與共黨關係匪淺，此時此刻的中國會有何種變化呢？從整個東亞大局的發展來看，實令人隱憂不堪。處於此種變局之下，日本的主政當局似乎絲毫不曾察覺其危險性，更遑論挽救，日本之不幸，莫過於此。

41

從此封信函可以看到，犬養毅對九一八事變的認識層次與關東軍及當時主政的若槻總理、外務大臣幣原等人是全然不一樣的。犬養是以中國內政的演變來探討九一八事變的嚴重性，而關東軍與日本政府都對此漠不關心。關東軍迷信武力，刻意策劃九一八事變，就是要蠶食中國，<sup>42</sup>在這種蔑視中國的心態下，當然不會顧及中國政潮的演變。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卻是把所有主力放在安撫列強的反彈，<sup>43</sup>認為只要能消除列強對日本的牽制，中日之間所有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在此種認知的基礎上，中國政府任何反應對日本而言都是不關痛癢，更遑論中國內部的一些調整了。

日本政府這種將九一八事變解決的方式，端視列強反應而決定的基本態度，尤以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最為明顯。幣原原對九一八事變持反對態度，認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除會觸犯九國公約，導致西方列強各國的制裁外，也會因此激怒蘇聯，引發日蘇大戰。基於此一考慮，事變初期，他熱衷推動中日直接交涉，樂於見到和平解決爭端，<sup>44</sup>但隨著事變擴大，關東軍的軍事侵略行動日益擴增，國聯及美國的反彈卻異常軟弱；蘇聯也全無制衡的表示。反而關東軍培養的傀儡勢力卻異常成功，張學良手下的各大山頭紛紛宣佈獨

<sup>41</sup> 〈副島義一宛犬養毅書翰〉（1931年10月2日），收入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書簡集》（東京：人文堂，1940年），頁571。

<sup>42</sup> 真井勝美，《滿州事變—戰爭と外交と—》（東京：中公新書，1988年），頁97；又參閱中村菊男，《滿州事變》（東京：日本教文社，1965年），頁113-114、128-131。

<sup>43</sup> 若槻禮次郎，《古風庵回顧錄》（東京：讀賣新聞社，1975年），頁376；又參閱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東京：岩波書店，1950年），第2卷，頁62-63，頁91-92。

<sup>44</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77年），第1卷第2冊，頁305。

立，轉身投入日本懷抱，這些演變也促成幣原改變其原有態度，轉而支持關東軍。<sup>45</sup>並開始期待藉由此一事變，能一勞永逸解決中日兩國在東北地區的各種懸案，將東北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sup>46</sup>

從上所述，可知日本政府的對策，完全是為了因應列強的反應。與日本政府相比，犬養對九一八事變的觀察，卻是立足在中國政潮演變的此一角度。因此一開始他就不以列強的反應為考慮要點，也不將九一八事變單純地視為列強與日本的攻防戰。鑑於他不受列強反應的影響，因此更能深刻認識到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政壇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國民政府為應付此等挑戰而可能衍生的國共談和、中蘇接近等日本最不樂見發生的事實。犬養深恐九一八事變會造成中國被赤化的危機，因此他比當時的主政者更殷切地期盼事變能早日和平解決。故而 1931 年 12 月 13 日，犬養毅出掌日本首相之後，中日和議的契機就油然而興了。

#### 四、密謀和平的經過

1931 年 12 月 11 日，若槻內閣因閣內意見不能統合而宣佈總辭。翌日，犬養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薦下被任命組閣。新內閣於 12 月 13 日宣告成立，外務大臣則是當時日本駐法大使芳澤謙吉。芳澤是犬養的愛婿，在他返國任職前，外務大臣一職由犬養親自兼任。新內閣組成後的第一篇針對九一八事變所發表的外交聲明是在 12 月 27 日。當時犬養以外務大臣的身份，宣示新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行動肯定為自衛行為。其次，對 12 月 22 日關東軍將軍事行動擴展到錦州，向張學良在東北的最後軍事據點發動攻擊之事，則輕描淡寫地解釋為掃蕩馬賊的治安活動。至於關東軍在佔領區直接接管各地方行政組織之事，犬養則歸咎為中國各地方的民政官僚不負責任因而造成的後遺症。依他的說法，事變爆發後東北各地的民政官僚不是集體逃亡，就是集體辭職。鑑於地方民政組織的瓦解，關東軍為拯救佔領區不要陷於無政府狀態，

<sup>45</sup> 最能象徵幣原對九一八事變態度的轉變，莫過於他在十一月上旬同意撥交三百萬機密費用支援關東軍在齊齊哈爾方面進行收買馬占山，建立親日政權的政治分化計劃。同上，第 1 卷第 1 冊，頁 459、473-474。

<sup>46</sup> 俞辛焞，〈滿州事變と幣原外交〉，《日本史研究》（1983 年 9 月），頁 30-60。

不得不參與各地的行政組織重建工作。他最後強調，造成此等既成事實，並不是基於關東軍的意願，而是事實自然演變的結果。<sup>47</sup>

從犬養接掌政權以後的公開發言，可以理解在正式場合，犬養的基本態度和在野時代的政友會總裁並無兩樣，對關東軍的所有行為是持正面肯定態度。既然犬養內閣不反對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對關東軍一手自導自演所造成的既成事實——「滿洲國」的締建，自然也不會反對。1932年3月12日，犬養內閣為因應「滿州國建國宣言書」的正式發佈所召開的閣僚會議上，通過了「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決定了日本今後政策的走向是如何協助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地成為一個新國家。<sup>48</sup>此一決定無疑地表達了犬養內閣對新政權的支持。

如前面所提，犬養個人對九一八事變的認識與他具銜以公職身份宣示的政見，是有明顯差距的。而表達此差距的最具體事實，莫過於犬養的私自向中國謀和了。

犬養毅於接任內閣總理的第三日（1931年12月15日），就選定友人萱野長知為他個人密使，派遣到中國謀和。<sup>49</sup>希望利用其與國民政府首腦們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私人管道，<sup>50</sup>在非官方的基礎上，事先達成協議，而後利用此既成事實來逼使關東軍沒有擴大爭端的藉口。貴為一國總理，而須出此下策，最主要還是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日本與中國做「有取有捨」的公開性外交談判。當時在日本軍部刻意操縱輿論的情況下，<sup>51</sup>日本全國人民都陶醉於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絕對性勝利。當全國人民都在慶賀關東軍所帶給日本

<sup>47</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77年），第1卷第2冊，頁482-485。

<sup>48</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下卷，頁204-205。

<sup>49</sup> 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2。

<sup>50</sup> 被犬養選派為密使的萱野，素享有中國通的美譽，辛亥革命期間曾追隨黃興轉戰漢陽，也是少數深得孫中山生前信任的日本友人。犬養選中萱野，也是看重他與中國革命運動的深厚淵源，認為他的出使較易得到中國政府要人們的信賴。參閱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東京：皇國青年教育會，1941年）。

<sup>51</sup> 江口圭一，〈滿州事變と大新聞〉，《思想》（1973年1月），頁98-113。又參閱分須正弘，〈滿州事變前における世論形成：軍部の世論工作を中心にして〉，《政治經濟史學》（1982年4月），頁32-36。

巨額戰利品之時，實不容政府再與中國政府公開談判這些戰利品的歸屬問題。何況，犬養在黨的地位以及政友會傳統的強硬對華政策等因素，在在使犬養不能貿然行事。蓋犬養當時已七十七歲，二年前他能以七十五歲之高齡出任政友會總裁，主要是得力於當時黨內兩大派系相持不下，黨內面臨分裂危機。而犬養在政友會雖然只有四年黨齡，而又屬於小派系，但他有完善的從政資歷，由他出任過渡總裁，可制衡派系之爭。<sup>52</sup>政友會在眾議院擁有二一七席次，但犬養能掌握者只有當年隨他入黨的二十幾席次，<sup>53</sup>在這種基礎下，犬養的任何政治措施當然非得小心翼翼不可，更遑論他要推動一個與政友會傳統背道而馳的新政策。

在犬養密謀與中國和談之際，胡漢民卻正式透過日本駐廣東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積極向犬養呼籲兩國和談。胡是粵方大老，在當時國民黨內部還有寧粵之爭時，他的呼籲，無疑地指出犬養與國民政府的情誼並不局限於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而是廣泛地受到國民黨內部各主要派系的肯定。只是處在日本政局困境中心的犬養未能正面回應胡漢民的呼籲，反倒官式的命令日本駐廣東代理總領事須磨予以正式回絕。<sup>54</sup>他這種無法與中國公開談和的表態，明顯地呈露出犬養個人的理念和當時日本政局走勢間的衝突性。

萱野於 12 月 21 日到達上海。此一時期，也正是國民政府中樞內部異動之時。誠如犬養事前的預料，九一八事變之後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積極與廣東臨時政府謀和。兩派協商之結果，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宣佈引退，辭去一切公職。其主席職位由廣東臨時政府要人林森接任，行政院長職位由另一廣東臨時政府要角孫科接替。寧粵兩政府也利用此一改組機會宣佈合併。

萱野到達中國後，選擇交涉的對手是預定出任新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職位

<sup>52</sup> 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 年），中卷，頁 833-834。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ロンドン海軍軍縮問題をめぐる諸政治集團の対抗と提攜》（東京：東大出版會，1980 年），頁 216-220。

<sup>53</sup> 時任英人，〈犬養毅と滿州事變〉，頁 47。

<sup>54</sup> 胡漢民向犬養呼籲中日直接交涉是 12 月 19 日，而犬養決定派萱野到中國謀和是 12 月 15 日。見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頁 512；又參閱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 年 8 月），頁 82；及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77 年），第 1 卷第 2 冊，頁 476-480。

的居正。<sup>55</sup>萱野之選定居正，是因為萱野無親生子女，曾認居正的次女為養女，兩人有非比尋常的信賴關係。<sup>56</sup>如從雙方交涉的結果來看，萱野的任務可說相當成功。抵達上海的第二天，萱野就向犬養發出以下的電報：

- 一、為確立滿洲政權，將組織以（居正）為主任的委員會，一切懸案均委以（居正）權限，在當地交涉。
- 二、嚴厲懲罰（張學良）。
- 三、任命（居正）的同時，雙方即刻停止軍事行動。<sup>57</sup>

從這一通電報內容中，可知雙方已達成初步協議。協議的兩大要項，一是國民政府在撤兵問題上做巨大讓步。另一是查辦張學良。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一貫原則就是主張「先撤兵後談判」。個中原因，無非是恐懼在日軍大軍壓境之下，非但不能和日本做合理交涉，反而有被逼訂城下之盟的顧慮。<sup>58</sup>而此刻國民政府肯做如此讓步，當然有其客觀主觀上的要件。依恃國聯並不能有效制衡日本是其客觀要件，而對犬養持信賴態度則是主觀要件。換言之，九一八事變初期，國民政府主動放棄中日直接交涉之路，堅持不撤兵不談判。<sup>59</sup>但此刻日本仍未撤兵，而國民政府卻願接納日方先談和的要求，其主要因素還是一種互信問題。犬養的信譽是促成中國願意與日本重開協議大門的關鍵所在。

協議中另一要項是懲辦張學良。此項協議意味著雙方在處理東北善後問題的新藍圖上，已決定不讓張學良再有立足之地。達成協議的此刻，張學良

<sup>55</sup> 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3-84。

<sup>56</sup> 居正次女原名瀛玖，過繼給萱野家後改名萱野華惠。見居鐘明志，〈我的回憶：上〉，收入朱傳譽編，《居正傳記資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卷2，頁35-36。

<sup>57</sup> 電報原件。此電報原為萱野長知所有，後由宮崎世竜保管，再經由日本女子大學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供給筆者。以下本文註解所列電報原件，皆為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供。

<sup>58</sup> 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頁368-369。

<sup>59</sup>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即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會商，謀求直接交涉的可能性。在此次會談，宋以個人身份建議兩國立即各選三位代表共組委員會，急赴現場調停爭端。但是到9月22日時，宋子文則以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日益擴增，日本政府是否仍能駕御軍部的實力為由，強調除非將關東軍調回原防區，否則絕不輕言與日本交涉，正式回絕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傳來願以宋子文原提案之方式解決兩國爭端的覆電。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77年），第1卷第2冊，頁288、305、308、312-313。

的大軍還部署在東北的錦州，與關東軍採取對峙之勢。雖然表面上國民政府一再嚴令張學良「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sup>60</sup>但在後方的和議中，雙方代表卻已就犧牲張學良一點上達成協議。從此點可看出廣東臨時政府的要人們在主控國民政府後，已無意支援張學良在錦州方面的戰役，而張學良是否會死守錦州，也非國民政府最關心的課題。

由於萱野的對華交涉，是根據其個人的私人管道，而非透過外交部的正式管道，因而引起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的不滿，為此陳部長向日本駐南京領使提出抗議。<sup>61</sup>但顯然此抗議未曾影響到萱野和國民政府核心要員的談判，只是，其密使身份嚴重的曝光，對謀和往後的發展，造成很大的變數。12月24日，他到南京面謁預定出任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行政首長的孫科。<sup>62</sup>與孫科的直接交涉之後，他向犬養發出以下的電報：

中國政府為解決滿洲問題特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任命居正為主席，許崇智、陳中孚、朱震青、傅汝霖等人為委員……委員會任務是改組東北各省的行政組織，整理行政事項，維持秩序，查辦張學良（已和張學良的部份手下取得聯繫）……解決中日兩國間的所有懸案。所有事務將委託居正一人全權處理……發表以上各委員的任命時，中日雙方即應立刻維持現狀，居正到任以後，中日立即商訂日本撤兵等事宜。

<sup>63</sup>

從萱野的日記來看，12月24日他與孫科的會談，已達成決定性的協議，爾後幾日他的主要活動反而只屬於聯誼性質而已。29日他返回上海，此期間他發給犬養的電報內容，大多集中在報告廣東臨時政府要人入主中央後的一些人事變動，<sup>64</sup>以及國民政府策反張學良部下的情況。<sup>65</sup>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

<sup>60</sup>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3年），第34輯，總頁7787。

<sup>61</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80年），第2卷第2冊，頁663-664。

<sup>62</sup> 1931年12月22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在此次大會上，孫科於12月28日被選任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第3冊，頁121-122。

<sup>63</sup> 電報原件。

<sup>64</sup> 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6。

<sup>65</sup> 1931年12月30日，萱野長知向犬養發出了以下電報：「……天津方面已經和（張學良）

出，自廣東臨時政府要人入主中央後，國民政府剷除張學良勢力的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萱野於抵華後，雖連發七封電報給犬養，卻一直沒有回音，遂於 12 月 31 日轉向總理大臣秘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報告，並詢問內情。<sup>66</sup>第二天，即 1932 年 1 月 1 日，犬養健回電如下：「總理因到伊勢神宮祭祀，故沒回電，張學良數日內有從錦州撤軍傾向。其撤軍後，也就是 1 月 10 日左右，請居正先生啓程赴東北。日本方面也會派遣職位相當的人物趕往東北。」<sup>67</sup>從此回電中可以確定犬養毅對萱野與孫科的初步協議沒有異議，並且也已著手安排雙方代表在東北進行正式談判。電文中所提到的日本代表，據犬養健事後回憶，是預定由政友會的政務調查會會長、原滿鐵總裁的山本條太郎擔任。<sup>68</sup>正式談判要等張學良從其東北最後一個據點錦州撤退後才舉行，這個決定再次印證雙方無意讓張學良重返東北的決心。

萱野接到此電報後，立即回電，稟報犬養，居正將於 1 月 9 日如期趕赴東北的消息。<sup>69</sup>從此電文中可看出，交涉的過程一切都很順利。萱野也很成功地達成他的使命，中日雙方就靜待 1 月 10 日之後在東北舉行的正式和談會議了。

## 五、謀和失敗始末

正當國民政府開始慶賀中日和平重現曙光之時，<sup>70</sup>和談的交涉卻有戲劇性的變化。首先是 1 月 4 日，萱野接獲東京來電告警。電文的主要內容是告知

部下的六個旅取得聯絡，準備從內部著手將其勢力瓦解，學良也因日本的壓迫以及新政府的成立，而察覺自己不利的立場，再加以手下部隊的謀反，西北軍又在後方窺視，已開始狼狽不堪……」。電報原件。

<sup>66</sup> 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 年 8 月），頁 87。

<sup>67</sup> 電報原件。

<sup>68</sup> 犬養健，〈山本條太郎と太養毅・森恪〉，《新文明》（1960 年 7 月），頁 29。

<sup>69</sup> 電報原件。

<sup>70</sup> 1932 年 1 月 4 日關東軍攻佔錦州後的第二天，外交部長陳友仁與美國駐南京總領事派克（Peck）談話時，還表示日本內閣總理犬養毅已就東北問題和他作非正式的接洽，並認為東北問題可藉由交涉解決。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III (Millwood, NY: Kraus Reprint Co., 1932), pp. 3-4.

萱野，犬養已無法收到他的來電，詳細原因正在調查中，請他改用暗號等語。不料第二天，萱野卻接到犬養毅具名要他即刻返國的電報。為此已達成基本協議的中日交涉不得不中途擱置，居正的東北之行也被迫取消。1月8日萱野返回日本，<sup>71</sup>中日和平交涉也就因此中斷了。

犬養急令萱野返國，中止中日和平交涉是起因於日本陸軍軍部及外務省的反對。萱野抵達中國的初期，犬養毅剛好前往日本南部三重縣的伊勢神宮祭祀，不在官邸。因此萱野的來電被內閣書記官長森恪截獲。<sup>72</sup>森恪雖不知密碼，但也察覺犬養毅暗中在中國有所部署，乃將此事告知軍方。自此，軍方一方面嚴密監視中國與犬養方面的電訊往來，另一方面則積極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除軍方的部署活動外，外務省方面也有萱野在中國謀和的情報傳入。1931年12月31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首先電詢犬養毅有關萱野密使身份的真偽。同日又再發一電，報告駐華公使處搜集到萱野與居正交涉後所達成基本協議的內容。<sup>73</sup>第二天，日本的軍部也搜集到與外務省內容同樣的情報。<sup>74</sup>自此，萱野密使身份曝光，謀和的行動已被日本陸軍部與外務省所掌握。於是外務省的有關事務部門以不先知會該等相關部門而擅自派遣萱野謀和之事，是違反公務行政法為由，向當時兼任外務大臣的犬養毅提出抗議。爾後，外務省又以萱野的謀和方針違背外務省與陸軍軍部、海軍軍部各相關事務部門間最新擬定的「滿蒙問題處理方針大綱」為由，要求犬養毅中止萱野在中國的活動，並要求他即刻返國。<sup>75</sup>犬養就是在這種壓力下，被迫中止與中國的謀和行動。所謂「滿蒙問題處理方針大綱」，就是要積極配合關東軍在東北的謀略，為偽滿政權成立而催生的政策。<sup>76</sup>此一政策是經過外務省、陸軍軍部、海軍軍部的行政官僚全程參與而制定的。從這個背景來看，支援關東軍，扶

<sup>71</sup> 電報原件；又參閱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7-88。

<sup>72</sup> 岩崎榮，〈犬養密使：萱野長知の日誌〉，《中央公論》（1946年8月），頁86；又參閱犬養健，〈山本條太郎と太養毅・森恪〉，《新文明》（1960年7月），頁28。

<sup>73</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80年），第2卷第2冊，頁657-658。

<sup>74</sup> 同上，頁661。

<sup>75</sup> 同上，頁660-661。

<sup>76</sup> 同上，頁661-662。

持偽滿政權，可說已經成為日本行政官僚體系的共同願望。

雖然，犬養在日本軍部與外務省官僚的反對下，被逼中止萱野的密使活動，但他並不屈服，此事可從他給居正的覆函內容中證實。1932年1月28日，日本軍部為轉移世人對東北的注意力，特地在上海挑起戰火。為此，一直盼望再開和議之門的居正，特地致函犬養詰問其誠意。犬養覆信云：

敬奉高諭，深感仁人憂世之言矣。僕以衰老之身，誤當調鼎之任，竊期以此機會定興亞之長計，是為孫中山先生之首唱，而僕等之共鳴，希閣下為黃種發揮大手腕為幸。<sup>77</sup>

此信函中，犬養雖未明言再度與中國謀和的方式，但卻充分表達出其仍未放棄謀和的決心。此刻犬養的重點則擺在國內，認為首要之務還是在整頓軍部。1932年2月15日，犬養寫了一封私函給陸軍元老上原勇作元帥，懇求他管束日本少壯軍人支持中日和平交涉計劃。信中犬養談到他對偽滿政權的看法。

滿蒙事變已逐漸接近閉幕了，如果按照現在的趨勢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形式繼續推展，必定會引起與九國公約的正面衝突。因此，如何維持一個形式上的政權分立，而實務上又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正是小生苦心思慮的重點。小生期待能早日解決此一爭端以便與中國改善關係。小生與南北要人皆有舊誼，自信比一般行政人員更能溝通，期待利用個人管道，將滿州視為是大風暴之前的小爭端妥善處理。此一關係如果不能早日改善，待俄國的五年計劃完成國力充實後，彼等絕不會似現在採默認政策。為了防備俄國，因此必需早日與中國的本部改善關係。<sup>78</sup>

從這一封信的內容中，可以理解犬養基於以下二點理由，認為日本絕不可允許偽滿政權的成立。第一點，違反九國公約。九國公約既然明訂保障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而日本還貿然策動成立偽滿政權。此舉無疑是向九國公約挑戰，必會遭致各國抵制。第二點，對蘇戰略上的考慮。九一八事變時期，蘇聯能不動聲色，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其全力投入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等

<sup>77</sup> 吳相湘，〈居正與司法革新〉，收入朱傳譽、王茱莉主編，《居正傳記資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8年），頁77-78。

<sup>78</sup> 驚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年），中卷，頁943-944。

第一期經建計劃（1933年）完成，蘇聯國力充實以後，絕不會漠視日本在東北的發展。為求戰略上佔得先機，日本需要中國的合作。因此日本絕不能因為偽滿政權的緣故而犧牲中國的友誼。為此，犬養介紹了他的解決方案，他認為為避免與九國公約衝突，日本不妨只求東北自治權的確立。唯自治權的確立方式，犬養沒有明言。不過根據當時一起參與萱野密使計劃的總理大臣秘書犬養健的回憶，犬養毅的原意是日本仍然尊重東北為中國固有領土，承認中國在東北享有主權。但相對的，日本要求中國在東北地區允許日本與中國享有同等的經濟開發權益，國民政府必須禁止一切性質的排日活動，同時在東北中蘇邊境地帶允許日本軍隊佈防。<sup>79</sup>

從以上犬養健的回憶資料來看，犬養毅的東北問題解決方案重心是擺在經濟權益的掌握。所謂日本與中國享有同等經濟開發權是何種含意，犬養健沒有做更進一步解釋。不過，曾參與居正與萱野協商的鄒魯，卻對此一議題提供了進一步的說明。鄒魯的說法是日本同意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取消內河航行權，但是中國卻須允許日本在東三省之商租權。基本上，就是二十一條條約中第二號中的第二、三款的重現。<sup>80</sup>原條款原文如下：

- 一、日本國臣民在南滿州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
- 二、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州任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一切生意。

眾所周知，中日兩國曾針對以上兩條款達成協議，並於1915年5月簽訂條約。由於此約的簽訂並非基於兩國的互願原則，完全是日本片面武力威脅下的產物。因此，條約簽訂後，中國方面一直以國內行政法來牽制此等條款的有效執行。例如，條約簽定後一個月，中國政府就發佈「懲辦國賊條例」，嚴厲禁止國人與外國人簽訂有關土地、礦山、森林等的租賃契約。制訂此行政命令的主旨就是期待能牽制日本在東三省新近獲得的商租權。除中央政府外，東三省地方當局爾後也常針對各種情況，秘密給予各縣級單位不同的訓

<sup>79</sup> 犬養健，〈山本條太郎と太養毅・森恪〉，《新文明》（1960年7月），頁27。

<sup>80</sup> 鄒魯，〈犬養毅確曾致力中日和平〉，收入鄒魯，《澄廬文選》（南京：正中書局，民國37年），頁153-154。

令，目的也是限制日本人對商租權的有效運用。<sup>81</sup>由於中國政府積極制衡在二十一條條約中賦予日本人在土地的取得及享用居住營業自由等特權的運用，深遭日本不滿。商租權的執行問題一直是中日兩國政府間的重大懸案。<sup>82</sup>而此刻犬養毅則利用九一八事變後的和平交涉，獲得中國商租問題上的讓步。藉由商租權的取得，九一八事變前的日本要求絕大部份都可說是已得到圓滿的答案。

從以上中日雙方相關資料的合併檢討，已能對當時雙方所達成的秘密協議的內容有一概括性的瞭解。此一內容除較屬次要的鐵路問題沒有提及外，<sup>83</sup>可說已滿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的主要訴求。但是此刻的日本，包括軍方、民間輿論，以及行政官僚體系等，卻都陶醉於關東軍新近帶來的戰利品，他們反對將這些戰利品送回中國。犬養的謀和行動就在這種壓力下屢遭挫折。向上原勇作求援的計劃，不但沒有得到上原的支持，反而因計劃的外洩，造成犬養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日趨緊張。此時犬養又興起運用天皇力量來整頓日本軍紀的計劃，但不料被海軍少壯軍人佔了先機，於 1932 年 5 月 15 日公然將其槍殺於總理官邸，<sup>84</sup>自此以後，日本的政壇上已無人敢對抗軍方，軍方的軍事急進政策也逐漸成為日本國策，中日和平交涉的管道也隨著犬養的去世而斷絕。

## 六、結論

<sup>81</sup> 水野明，《日中關係史概說》（名古屋：中部日本教育文化會，1990 年），頁 166-168、205-209。

<sup>82</sup> 林久治郎，《滿州事變と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東京：原書房，1978 年），頁 50、75、82-84。

<sup>83</sup> 在田中義一內閣時代，將鐵路問題與商租權問題並列為中日之間的重大懸案。但在 1930 年 11 月幣原主掌外務大臣時，對鐵路問題已有重大讓步。原政策是阻止中國建築任何可能影響滿鐵營運的鐵路，但新的政策只要求打通（打虎山至通遼）及海吉（海龍至吉林）兩線與滿鐵簽訂連絡運輸協定就可。見馬場明，〈解說〉，收入林久治郎，《滿州事變と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頁 160-166；又參閱水野明，《東北軍閥政權史の研究：張作霖・張學良の對外抵抗と對內統一の軌跡》（名古屋：中部日本教育文化會，1990 年），頁 295-300。

<sup>84</sup> 時任英人，〈犬養毅と滿州事變〉，頁 57-59。

犬養毅雖然早在明治時代就以熱心援助中國革命而聞名於中日兩國政界，但到大正中葉以後，卻因不滿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及其本人已有意退隱政壇，對中國革命事務開始刻意的保持拒離。不過，縱然犬養已無意過問中國革命事務，但他在中國革命陣營既有的身價卻絲毫不會受影響，他仍被視為是中國與日本政壇溝通的最重要管道，也一直是國民政府內各主要派系積極拉攏的對象。國民政府之所以一再爭取犬養，無非是一直無法在日本政壇中，找到另一位資歷相當並支持中國革命的適當人選。

中國革命事務再度引起犬養的關心是在於 1929 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具名邀請犬養赴華出席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的勵精圖治，讓犬養重拾對往昔革命友人的信心。國民政府的禮遇，也使他從一位已退隱日本政壇的過時政治人物，一躍成為日本朝野注目的中國通。無疑地，國民政府能從一地方勢力發展成為全國領導中心，此一事實的演變，也使犬養格外珍惜此一難得的政治資源。他與國民政府的這份歷史情誼，也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全國興起一片侵華的浪潮中，支持他堅信中日之間針對東北問題仍然能有商榷餘地的主要根據。

九一八事變自始就是關東軍自導自演的軍事行動。主政的若槻內閣雖然事前沒有參與，事後也沒有鼓勵，事變的翌日所召開的緊急閣僚會議並曾達成不將衝突層次升級化的共識。但是自始就不從中日關係惡化此一角度去觀察事變，反而把事變視為是日本與列強間的攻防戰。因此，當發現列強無意制衡日本時，對事變的態度遂逐漸改變，從反對轉為默認，進而演變成支持。而犬養對九一八事變的觀察，卻是立足在中國政潮演變的此一角度。由於一開始就不以列強的反應為考慮要點，因此更能深刻認識到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政壇所造成的衝擊。犬養深恐九一八事變會成為日本逼國民政府走向赤化的絕路，而國民政府的赤化會進而破壞東亞權力的均勢，短期而言將引起日本與簽訂九國公約的西方列強衝突，長期發展來看，又勢必會導致日本與蘇俄的爭戰。基於此一認知，他認為早日解救國民政府的困境是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由於犬養急於早日為九一八事變善後，因此當他擔任總理後，立即派遣密使試探和平。

交涉的過程雖然稍有曲折，但雙方的代表以及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關係，

使雙方的交涉能順利擺脫外來的阻擾。至於交涉的內容，更未曾引起雙方代表之間的爭執。導致此次交涉中止的卻是當時日本的政治環境。九一八事變雖然不是政府既定政策下的產物，但關東軍急進政策所帶來的戰利品卻普遍贏得日本官僚系統及軍部的讚賞。逼使犬養中止和平交涉的關鍵，就是這股來自行政官僚體系及軍部的反對壓力所致。而犬養最後遭受槍殺的命運，也是起因於他與這股反對將東三省回歸原狀的勢力對抗所致。犬養的驟逝，斷絕了中日溝通的橋樑，也斷絕了中國方面謀和的希望。自此中國喪失了與日本政界溝通的管道，也喪失了對日本政府仍能抗衡軍部掌握全國大局的信心。